

《学习有理》特别策划“思想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⑦

# 重视浙江文脉中的“浙学”品牌

杨国荣

## 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如何传承好、弘扬好绵延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为当下国家和民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新时代文化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推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则是其历史使命。

浙江具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到后来的总序中,又体现了与文化相关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内涵。早在世纪之初,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就基于对浙江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的深刻把握,亲自部署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并担任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主任。他在2006年5月30日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所作的总序中,详细讲述了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目的和意义:“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和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时至今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已实施近20年。聚焦“今、古、人、文”四个方面,这一工程通过系统梳理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关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沉下来、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在这里,主要从如何理解浙学的角度,对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如何进一步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作一考察。

历史上的不同学者,对于浙学有不同的理解。在朱熹看来,“浙学却专是功利”。这一意义上的浙学主要指宋代理学,包括永嘉、永康等相关学派。从具体形态来看,浙学的内涵显然不限于朱熹所界定的与事功相关的学术思想。事实上,即使在宋代,“浙”地除了事功之学以外,还有吕祖谦、张九成等具有理学倾向的思想家。在宋代之后,“浙”地之学更呈现复杂多样的形态。

广义上的浙学则可以看作是“浙”地相关的思想流派,与“浙”地有关又不囿于“浙”地,内涵和外延更加宽泛。从时间上看,并



不局限于宋代等特定的历史阶段。至少从汉代的王充开始,广义上的浙学特点已开始呈现。到了近现代,尽管很多学者的学术活动在地域上已跳脱浙江范畴,但其学术风格仍可以看出浙学的某种印记。

从“今、古、人、文”四大角度研究浙学,可以对其意义有更深刻的认识。齐鲁之地在孔子、孟子、荀子之后,似乎既没有出现气象和格局较大的学派,也未能持续不断地产生具有创造性、系统性和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宋代以降,洛学、闽学、关学、蜀学、湖湘之学等先后而起,但其关注之域较为限定,而且除开创者之外,也较少形成重要的、有原创性的思想家。浙学则呈现持续发展的形态。从汉代的王充,宋代的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到明代的王阳明及浙中王门,明清之际的刘宗周、黄宗羲,清代的章学诚,近代的章太炎、马一浮,直到现代的金岳霖、冯契等,这样不绝如缕,代有人出,延至现代和当代的地域性学派,确实较为少见。从气象的博大、学术的创造性、延续的历史持久性以及涉及的广度等方面看,广义上的浙学在整个中国文化演进中无疑具有独特的地位。而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已出版书目及在研项目以广义上的浙学为主,在呈现地域性品格的同时,也注重逻辑形态和逻辑脉络的揭示,而且形态、内容丰富多样。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浙江考察时,指出浙江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赓续历史文脉,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前,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三期已经启动。“浙学”依然是一个响亮的品牌,是一大着力点。进一步研究和阐释浙学,对于当下更好地理解浙江文化,更好地把握浙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作用乃至更好地感悟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都具有积极意义。

尽管从外在形式来看,同属广义浙学范畴,有的侧重于哲学,有的偏向历史,学术进路、学术方向也各有不同,但在内在的思想层面和思维倾向上,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人物之间又有其相通之处。具体地看,体现在以下几个不同的方面。

注重理论思考或理论阐发,可以看作浙学的共同趋向。以王充为例,作为广义浙学的早期人物,他虽然往往被贴上经验主义标签,然而事实上其思想包含着重要的理论创见,不乏独特的哲学见解。后来浙学中的人物也从不同层面上表现出类似的趋向。比如永嘉学派,尽管治学趋向主张经世致用,总体上被归为事功学派,但同时又从物、道、势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对传统儒学作了阐发,其思想并非仅仅能用“事功”这一概念可以简单概括。这一点在叶适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批判当时主流的理学,认为理学家“专以心性为宗主”,导致的结果是“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相对于理学,永嘉学派更注重实际,并主张“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事”不同于“物”,“物”主要表现为对象性的存在,“事”则与人的活动或人的践行相联系。“验于事”意味着通过参与现实的社会实践来验证知与言。它既以作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为指向,又将这一过程与对世界的独到认识(知与言)联系起来。可以看到,相对于就事论事、就材料论材料的学术进路,浙学确实更注重理论的创造。

反省与批判,是浙学内含的另一自觉意识。浙学和主流的文化学术常常不一致,浙学代表人物往往很有个性,并勇于质疑、挑战主流的思想。王充以无畏的学术精神“问孔”“刺孟”,其锋芒指向的是当时的正统意识形态。永嘉等事功学派也展现了与宋代主流理学不同的进路。心学是浙学的重要构成,以王阳明的思想为主要的载体,同样表现了上述趋向。例如,在王阳明之前,程朱理学比较注重普遍的“天理”,陆九渊的心学则强调个

体的“吾心”。与之不同,王阳明认为心和心理无法相分,并由此阐发了“心即理”的观念。心和心理的相互联系(心即理),以良知为其承担者,这一意义上的良知既非普遍、抽象、空洞的天理,也不仅仅是个体意识,而是以两者的融合为内涵。在执着于普遍天理而疏离个体之心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容易习惯于服从外在的要求或根据权威的观念去行动,而缺乏自己独立的判断。因此,王阳明对心与理关系以及良知的理解,实质上也为浙学的独立思考 and 批判意识提供了内在根据。

浙学的独特品格,同时展现于对现实的关切。浙学中的人物,不同于书斋型的思想家,他们不满足于闭门涵养,而是更多地将目光放在社会现实及其变迁过程上。从王充之学,到宋代浙地事功学派,再到清代浙地学者,都从不同层面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并试图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思想的资源。如叶适强调“振民而育德成物”,“成物”表现为成就世界与成就他人,“振民”则展开为更广阔领域的践行活动,实质上构成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现实关切的具体内容。

具有历史意识,是浙学值得关注的又一特点。浙学中的不同人物和流派,都关切历史,注重社会、思想的变迁。王充对学术、思想问题的思考,往往与历史的回溯相联系,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特定的问题本身。后来事功学派同样注重历史沿革,注重整个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以及原因,注重历史人物的作用。王阳明曾提出一个著名论点,即“五经皆史”,在他看来,从实际的形态看,儒家历史上的经典都涉及历史的展开过程,其内容包含多样的事:人所做之事在社会演化中展开为古今历史,五经则是历史的记载。在黄宗羲那里,历史意识进一步具体化为对学术史的看法。黄宗羲曾系统地研究从宋元到明代的学术史,著有《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其中,《明儒学案》由他独立完成,《宋元学案》由他开始,尔后由黄百家、全祖望等人续成。在这一过程中,黄宗羲也提出了关于学术演变历史的看法,包括“一本万殊”(“道”或“理”展开于不同方面)、“分源别派”(对历史上各种观念、流派加以梳理)、“得其宗旨”(把握每一学派的主要观点)、“明其血脉”(揭示思想衍化的内在线索)等。以上思想为后来的浙东史学提供了理论前提。

要而言之,浙学人物众多、思想各异,其形态呈现纷繁复杂的特点。然而,通过纷繁复杂的形态去考察其思想脉络,便不难注意到浙学的文化精神,后者同时展开于上述多重方面,在今天依然有其现实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 国际留言板

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

我在高中时首先对中国的政治感兴趣,随后对历史感兴趣,并开始学习中文。1966年,我进入荷兰的莱顿大学,有幸接触到中国从古至今的历史和文化的多个方面,发现中国历史中既有连续性,也有变化。我对唐宋过渡期产生了兴趣,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时期之一。在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基础上,我对浙江区域思想文化产生了兴趣,将注意力转向南宋婺州(金华)吕祖谦领导的浙东学派的研究,并逐步往下延伸到明代婺州思想文化的研究。

德国汉学家 Oliver Radtke(纪韶融)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给予我们《良渚文化研究学术外译》项目巨大的支持。依托浙江文化研究工程这个优秀的平台,我们得以继续进行良渚学术的外译,继续在学术的层面让世界更多国家和人们了解良渚文化。我们也看到,和我们同一批获得资助的不仅有浙江省的高校及学者,也有外省的甚至外国的高校及学者,这正体现了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目聚合全球智力的大智慧、彰显天下大同的大胸襟。

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しん こく(沈国威)

浙江才俊敢为人先、勇于求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早在20余年前就和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建立了共同研究的关系,研究成果作为“日本与浙江”系列丛书出版,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今年5月,“清末浙江留日学生群体研究”入选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目,我也得以参与其中,主持绍兴、金华、衢州的留日学生群体研究的子课题,感到无比荣幸。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决心与中国同仁一道,为留学史研究尽绵薄之力。

喀麦隆籍外教 TALING TENE RODRIGUE(大灵·德内·罗德里格)

我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精髓所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中国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不仅展现了极高的研究水平,而且研究范围颇广,内容颇丰,涵盖了人文、历史、政治、艺术等。

西班牙外教爱莲

浙江的文化不仅丰富多彩,还特别有魅力。无论是历史遗迹、风俗习惯,还是美食,都让我对浙江这片土地充满热爱。浙江文化不仅是浙江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了解和珍惜。

## 我来讲故事

###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亲历者邵清——投身文化研究工程的觉悟和担当

从2008年下半年参与到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具体组织管理工作中,到2021年8月从浙江省社联退休,这十多年时间,随着文化研究工程的不断推进,我对工程初始立意的领悟和体会不断深入和丰富,自身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也得到很大的升华。

我们不断地提升文化研究工程的站位,拓展文化研究工程的视野,以实现区域文化的认识深度和阐释广度。比如在论证浙江史前文化研究项目时,我们不断组织考古学和历史学专家反复讨论,不仅要讲清以上山、河姆渡、良渚为代表的浙江史前文化对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形成的贡献,还要探讨诸如稻作文明的起源和传播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当今文明互鉴的意义。

我们在工作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今、古、人、文”四大板块不是孤立的,历史文化研究和当代发展研究应该是并重的。历史和时代统一的思想方法,必须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规划和研究过程中。因此,“改革开放与浙江”的研究项目成了文化研究工程一以贯之的重头戏。在论证“浙东唐诗之路研究”时,学者们已经关注到浙江的重要水系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为浙东唐诗之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和大运河诗路的建设积极建言献策,有几个研究团队还直接参与四条诗路文化带建设规划的制定。

经过近20年的实践探索,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为如何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化水平积累了丰富而有益的经验,是符合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规律的学术研究管理范式。我们总结了“党委挂帅领导、政府支持保障、注重规划引领、学者广泛参与、地方联动推进、制度管理同步”的工程管理经验,这套模式既体现文化研究工程的认识形态属性,也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组织管理要求,是浙江对有组织科研的成功探索。

我们一直在思考学术与大众的关系,一直在尝试如何让学术研究的成果成为受大众欢迎的文化雨露。“浙学经典读本”是希望浙学经典更贴近普通读者;“文化的力量”电视片是希望大众关注、了解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与你同行”一季、二季、三季接连推出,文化研究工程的学术著作成为成千上万小学生的课外研学指南。

投身文化研究工程,让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那种充满诗意的觉悟和担当。

### 《大家文萃系列丛书》出版负责人任娜娜——可读可赏可听的文化“小书”

我是新浙江人,在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度过了整个大学生涯,毕业后也在这里扎根立业。浙江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省,历史悠远,人文荟萃。从事文化出版行业以来,我们接触了太多浙江文化学人的故事,早就希望能够为浙江本土的文化事业做一点什么,加上在参与“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中积累的专家资源优势,我们觉得是时候做这样一套家乡文化“小书”了。

为什么是一套“小书”呢?因为我们深知,发现一本书价值的前提是大家愿意把它打开来看。书籍的编辑与出版,不仅需要注重其核心价值,也须回应新时代、新教育、新媒体的挑战。生活在网络时代的年轻人,每天都在“阅读”,难处在于如何找到切合自己心境、值得再三品味的图书。这套书题为“文萃”,表明这是一套“小书”,不以“收藏”或“研究”为目标,而是以“阅读”为宗旨,故“好看”是第一位的。我也希望图书出版后,通过新媒体的形式,让读者与编著者在直播互动探讨,聊聊读书、谈谈心得体会,可以让读者与编著者近距离对话。

当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套“小书”能够在提供阅读便利的同时,达到让大家不忍“释卷”的效果,从而深度感受浙江文化大家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所以,读者可以看到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中央美术学院邱振中等数十位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来做内容选编,选择的都是



近代浙江文史大家的优秀作品。从中我们可以领略蔡元培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可以感受鲁迅对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深刻思考,可以学习王国维大胆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创新理念,等等。

2021年,由浙江越飞集团申报、北大陈平原教授做丛书主编的《大家文萃系列丛书》被列入“2021年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立项重大课题(第二批)”。第一辑的申报是20本。由企业申报并获得重大项目是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的一次尝试。作为全程的参与者,我感到与有荣焉。在未来,我们希望推出更多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助力营造全民阅读的氛围,为打造“浙学”品牌、推动浙江本土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 杭州国家版本馆“文润时代宣讲团”成员姜柯易——回溯浙里文化之河

我是杭州国家版本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有幸参与策划并推出“盛世浙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展”。策展布展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浙江的辉煌历史与灿烂文化仿佛华丽的长卷缓缓铺陈在眼前,整个体验如同在经历一次盛大的巡礼。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谈到,“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先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这条河流承载着中华古老文明的往昔记忆,也孕育着未来发展的前进方向。虽然“溯洄从之,道阻且长”,但是唯有知其所长,方能明其将往。成果展以版本诠释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意义就在于此。

在策展的过程中,我沉浸于工程展现的悠久历史。从良渚先民在绿水青山间打磨的第一件玉器,到名家巨擘在信札稿纸上书写的第一行笔画,转眼已是千年。岁月赐予这片土地薪火相传的文化力量与思想积淀。古往今来,浙江人民始终在以各种方式接续着这一伟大的传承。它是学者皓首穷经凝练的锦绣文章,是大师妙手丹青绘就的煌煌画卷,是巧匠苦心孤诣铸造的巅峰之作……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所要呈现与传承的正是这些来自历史的珍藏,是浙江人民对于家乡的反哺与馈赠。

历史于工程蕴含的璀璨群星。浙江文脉绵长,如钱塘江水奔流不息,如星辰的人物是这片土地永恒的精神财富。这里是勾践立志恢复的故土,这里是钱穆坐断东南的基石;这里见证过衣冠南渡,这里孕育过辛亥群英;王右军曾在这里挥毫,谢康乐曾在这里行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仿佛一台巨大的微缩景箱,将凡此种种都熔铸于一炉;又如同一本穿越时空的相册,千年人杰尽收眼底。

钦佩于工程凝练的时代精神。当代发展研究著作让时间的轴线跨越70多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火红岁月,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再到新时代的巨轮启航,浙江的弄潮儿们披荆斩棘,勇立潮头。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与汗水,创造出无数荣誉与成就,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此时,纸张与荣誉不再是风花雪月的载体,而是时代浪潮的见证。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实施以来,已推进到第三期。19年来,分“今、古、人、文”四大板块,累计立项课题2022项,国内外280多个单位10000余位社科专家学者参与其中,投入财政资金2.2亿元,预计形成学术专著5860余部,已经出版3360余部。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相关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吕祖谦全集》获国家图书出版提名奖,《江原集》获国家古籍出版一等奖;《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毛泽东在浙江的785个日夜》等成果受到中央、省直有关部门的肯定。



同治兰溪县八坊冈鱼鳞图册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项抢救性工程。兰溪市财政局与兰溪市档案馆共同保管的746册兰溪县鱼鳞图册,约10万页,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清代同治时期一个县的地籍资料,其系统性十分罕见。2022年,作为我国地方档案文献整理的标志性成果,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兰溪鱼鳞图册合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浙报制图:潘泓璇